

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

张三元

(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的要义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首要的、直接的原因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但生活方式具有本源性。生活方式通过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建立良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变革人的生活方式,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必须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必须克服享乐主义,倡导绿色消费,以绿色消费引导绿色生产,以绿色生产促进绿色消费,必须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精神文化的力量引导和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

【关键词】 绿色发展; 生活方式; 唯物史观; 构建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 [2018]03-0018-0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8.03.00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变革”,“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绿色发展时,三次谈到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对于绿色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科学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并不简单地等于绿色发展方式,而是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在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时,既要实现绿色发展方式,也要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没有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就不可能有绿色发展方式,也就没有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因此,科学地把握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方式构建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合理张力,以绿色发展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以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推动绿色发展,从而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理论课题和实践任务。

一、绿色发展的要义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作为一种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一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内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要求,但就其主要任务和直接目标而言,它主要是一种人们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以及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色发展的要义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展,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生活的关切和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新探索。

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是唯物史观的“绝对命令”。恩格斯在谈到人的自由时指出:“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②英国学者伯尔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领域,并且断言“自然中的解放是首位的”^③。尽管伯尔基并没有完全触摸到唯物史观的奥秘,但他把人在“自然中的解放”看做是人类“三维”解放之首,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唯物史观在探索人类自由

收稿日期:2017-11-15

作者简介:张三元(1962—),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人民日报》2017年5月28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③[英]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伍庆、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解放的实现条件和路径时,从来没有忽视、漠视甚至抽掉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基本维度,而是始终将其作为基本视域而予以高度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

在唯物史观中,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以实践为基础,人和自然之间既相分化,又相统一,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谐发展。人与自然首先是统一的,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和谐共生关系。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是深刻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由于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因此,自然界的丰富、和谐是人健康、幸福的重要源泉,是人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人的发展又为自然界的发展提供方向引导和智力支撑。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批判了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和做法,明确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②。

人和自然又是有差别的,是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的。虽然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但人更是一种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因此,既不能把人完全看成是一种自然物,也不能把全部自然看做是人化自然。这种差别性或对立性主要表现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联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联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③;人有意识、有思想,而自然界的其他一切存在物都不具有这个特性。这样,尽管人和自然界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但这两个规律具有显而易见的异质性。在自然界,人适应环境,又改造环境,人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因而,人影响并制约着自然,但自然即对象也影响并制约着人及其实践活动。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在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中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条件与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只存在于他“对感性世界直观中”,因而是“假定的”^④。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是不存在的。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否认“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恰恰相反,正表明他们对“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期待与向往,只是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和谐被破坏了。当然,这个“现实世界”是指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使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日趋强大。从表面上看,人类对自然一次又一次的征服,似乎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实际上,随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加重,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人类日益陷入无法自拔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之中,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⑤。所有经历过或正在经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国家或深或浅都陷入了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绞杀”之中,“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淤浅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域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⑥,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被釜底抽薪——由于不断的“贫困积累”,“自然的生命力”濒临枯竭,人类“赖以生活的无机界”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可以肯定地认为,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正如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卡尔·波兰尼所指认的,“如果不以损害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的本质为前提,这样一种制度一刻也不可能存在;它会毁灭人的身体健康,并把人类环境变成荒野”^①。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个社会制度,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只会越来越尖锐。这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洞见,也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坚持的立场和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才能真正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创造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除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个根本前提之外,人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至关重要。虽然自然对于人具有先在性,但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主动权在人的手里。人类要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既要顺应自然,也要改造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的观点不属于唯物史观。这两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其一,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要创造一个化自然,也要不断实现人的自然化。所谓人的自然化,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在把自然作为自身无机的身体的同时,也使自身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清醒地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及道理,才能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其二,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切计划、方案等都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②,因为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对待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比其他一切生物强的地方,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合理地改造自然。任何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只能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

毫无疑问,绿色发展理念与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或者说,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比如,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③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效地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建设生态文明,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也才能使人类正确认识和把握自身的命运。

二、生活方式是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因素

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因素很多,但人的生活方式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一个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人的生活方式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他们经常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并直接论述过人们的生活方式问题,具有丰富深刻的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不同方面或不同意义上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的,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具有复杂性。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生活方式大约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生活方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或人的活动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④。在这个意义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被纳入生活方式之中,构成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维。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得很清楚“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⑤。狭义的生活方式则是指人们消费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人们对“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经常使用“消费方式”、“享乐方式”、“生活需要”等概念,表达他们对人们的生活状况亦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切。

本文所讲的生活方式,主要是指狭义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全面性和丰富性,但主要是指人们的消费方式,或者说,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或主要方面。然而,在讨论这个

^①[美]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转引自[美]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

^③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页。

问题时,又离不开广义的生活方式的视域,因为,尽管生活方式不等于生产方式,但两者又不可分割。一方面,“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在总体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另一面,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论述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换言之,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影响和制约着物质生产方式。总之,两者互为前提、相互制约。当然,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就此而言,消费方式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消费方式,消费意味着生产。离开生产来谈论生活,犹如离开人们的现实需要进行生产一样,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在考察人们的消费方式时,不能没有生产方式这个视角。

在唯物史观中,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或者说,引起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的,首要的、直接的原因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而“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了两个基本点:一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二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主要关涉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直接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已经开始显现,并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对自然的占有和支配为前提。这是由资本本性所决定的。资本本性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绝对规律。资本虽然创造巨大的生产力,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种发展不是建设性的,而是破坏性的,它在推动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日趋尖锐的对立,使人和社会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之中。在资本统治中,自然界仅仅被当做资源的提供者,而人格化的资本则“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疯狂地吮吸“自然界的生命力”,而且,为了减少成本,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垃圾不经过任何处理而随意倾泻,造成严重污染,进一步地破坏了自然界的自我更新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断言:在现有关系下,“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它“只能造成灾难”^③。

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中,生产方式仍然是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直接因素。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表征:一是GDP主义的泛滥。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状况,GDP本身无所谓对错,而且,一定的GDP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惟GDP是从,就会形成GDP主义。改革开放以来,GDP主义曾长期占统治地位,甚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GDP的权威地位至今仍然没有动摇。在GDP主义的宰制下,GDP的增长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可以肯定地说,GDP主义绝对是撕裂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义力量。二是资本逻辑的强大破坏性。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市场经济是以资本逻辑为构建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资本,需要资本逻辑的强力驱动。资本逻辑在创造文明的同时,也必然使“现代社会如同置身于朝向四方疾驰狂奔的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这种力量必然将现代社会带入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型风险之中,这其中包括生态破坏和灾难”^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尽管不能完全归咎于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无疑是一个核心因素、根本因素。更重要的是,当资本逻辑与GDP主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时,自然界就被完全置于人的对立面,“人为刀俎,自然为鱼肉”。

但归根结底,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关系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从狭义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讲的,即主要地是指人们的消费方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页。

④[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方式的思想不一致。但实际上,这恰恰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尽管是常常被隐匿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本质时明确指出,需要是人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因而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因和根据。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时,用的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从来没有脱离“生活”这个核心要素。物质资料生产之所以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而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消费。而且,“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①。由此可见,在唯物史观中,生活是根,具有本源性,是生产的动机、根据和目的,离开了生活,就没有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归根到底是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作用的结果,或者说,生活方式特别是消费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生产方式来实现的。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日益膨胀的物欲不断加深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的全面而丰富的需要中,物质需要是最基本的,是人作为生命存在物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保证。尽管人的物质需要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有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即人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甚至没有止境。因此,可以把人的需要分为两大类:需要与欲望。需要是指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都有的生理上的、合理的需要,其基本特征是有限性或适度性,而欲望则“是心理上而不是生理上的,且其本性就是无所限制”^②。显然,人的欲望的日益膨胀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③,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商品世界。正如贝尔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需要,而是欲望,因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④。人们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自然界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是有限的,因而,以享乐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不断制造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快乐至死”的生活方式。

其次,外延式、粗放式的消费方式使自然环境难有喘息之机。外延式、粗放式的消费方式是指人们的物质消费重量轻质。当然,重量轻质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在绝对的意义上,人们的消费既有量的要求,也有质的要求,但在现代社会,重占有却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重占有主要是对量的要求,追求的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这种消费是摆阔气、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奢侈性消费,其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必然严重消耗自然资源,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严格地讲,人们消费的物质生活资料都来自于自然界,也就是说,人们消费得越多,自然界的“付出”也就越多。长此以往,自然界得不到休养生息,生态平衡能力不断弱化,最终必然导致生命力的枯竭。另一方面,人们在消费过程中,随意倾倒生活垃圾,不仅使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也使遭受累累创伤的自然环境“雪上加霜”。

再次,除了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也是人们基本的生活领域。文化生活本来是人的精神境界提升的通道,但在以资本原则构建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物质生活的附庸,甚至成为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文化的本真意义完全被遮蔽或消解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庞大的商品堆积”时,也使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成为现实。大众文化并没有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而是相反。一方面,文化之所以成为“工业”,根源于商品生产原则的普遍化。在商品化原则的支配下,文化作为一种需要,是通过生产出产品去满足的,因而,文化产品只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其表面是文化,实质却是商品。在这个条件下,文化消费只重量,只有大量的消费,才能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样,商品化的文化也必然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仍然需要大量地消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商品化的文化已经不能起到“化人”的作用,“艺术的存在由于被降低到大众商品的消费模式从而受到削弱。对我们来说,它已经失去了对我们的生存论的意义”^⑤。这种文化,倡导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把人培养成一种消费机器,形成“物化意识”,失去判断和批判能力,只知道消费,以消费为目的,以消费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大众文化不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目的,而是以创造出大量的消费人口和巨大的消费欲望为根本指向,这只能使以自然界的消耗为前提的享乐主义内化为人的一种“精神”,并进而转化为一场对自然界的更加疯狂的掠夺。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④[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⑤[英]A. 迈克莱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审美辩护》,《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

三、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实现绿色发展

既然生活方式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性因素,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建立良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在于变革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克服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建立一种新的、与时代要求一致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革命,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建立一种能使每个人都能获得真正幸福的新型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建立以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前提和表征。在中国道路进一步开拓,坚持绿色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生活方式变革的根本要求在于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或者说,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是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是一个基础性工程。

同样,绿色生活方式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绿色生活方式是指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或人的活动过程,是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时,“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②。狭义的绿色生活方式则主要是指绿色消费方式,即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最高旨趣,以高尚的消费道德、健康的消费心理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适度的消费,并通过这种消费方式引导和促进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生态文明。就此而言,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实质上是一场消费方式的革命。

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过程。道理很简单:作为人的生存样式,生活方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融入到人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生活方式不仅仅代表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而且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具有超越性。因此,构建绿色生活方式,首先必须要有正确价值观的引导,或者说,正确价值观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就有什么样的行动方向。当然,在某种意义上,生活方式本身就体现出一种价值取向。也就是说,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价值观构成生活方式的内核,而生活方式则是价值观的具体运用和逻辑展开。脱离价值观的变革来谈论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无异于缘木求鱼。一方面,要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道路这一高度,充分认识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确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整体关系,在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建设美丽中国。“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确立绿色消费观。消费观属于价值观的范畴,是价值观在消费问题上的体现。绿色消费观要求人们的消费方式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个根本要求,进行绿色消费。当然,正确价值观的确立还有赖于一个前提,即对资本逻辑的有效驾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体性遮蔽、消解甚至取代了人的主体性,而在中国市场机制中,必须克服资本主体性,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复归。也就是说,在构建绿色生活方式、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是人支配资本,而不是资本统治人,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应该说,这是我们的根本价值选择。

可以肯定,享乐主义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最大障碍。西方倡导的消费主义即是一种享乐主义,是与绿色生活方式根本对立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所提倡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它必然造成两个方面的“贫困积累”:一是自然界的“贫困积累”。消费主义以“庞大的商品堆积”为前提,但“庞大的商品堆积”是人对自然界疯狂掠夺的结果,必然造成自然界的“贫困积累”;二是人的“贫困积累”。消费主义以占有为前提,但占有并不等于富有,在占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人们拥有财富是一种幸福,但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止境而达到无限贪婪和无耻的地步,实际上比物质上的极端贫困更令人不堪。这两个“贫困积累”必然造成一个总的结果: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人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也就接踵而至。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③。这是历史的洞见。问题在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作用的逻辑展开,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也登堂入室,甚至扎下根来,疯狂滋长。毫无疑问,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生态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题、环境问题,都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有关。因此,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克服或抛弃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当然,克服或抛弃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倡导绿色消费,用节俭性消费取代奢侈性消费,用低碳消费取代一次性的污染消费。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积极地构建起绿色消费的社会机制,做到以适度为原则,以克己为前提,以合理发展为目标,以资源使用和污染物产出最小化为导向,从而保障绿色消费方式的合宜性。^①

构建绿色生活方式需要正确处理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的关系。实际上,两者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一方面,要用绿色消费方式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消费决定生产。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扩大内需是刺激生产的有效方式。扩大内需主要是着眼于量,即以扩大消费的量来拉动生产。显然,这种粗放式的消费方式已经过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也在快速地转型升级。在绿色发展成为时代潮流的条件下,人们的消费应该把质放在首位。而消费的质体现在消费的内容、方式等方面,也就是说,在消费内容和形式上,要提倡绿色消费,守住生态平衡这个底线。只有绿色消费蔚然成风,绿色生产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要用绿色生产方式推动绿色消费方式的形成。马克思认为,“‘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而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②。这里说得很清楚,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所以,构建绿色生活方式,又必须从生产端着力。生产决定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生产端的变革。当以消费刺激生产而导致一些行业、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或消费端出现非理性消费时,就要求进行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虽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产能过剩和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消费能力严重外流的问题,但对人们消费方式的引导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这既是生产端改革的重点,也是人们消费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

更重要的是,要提倡和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以精神文化的力量引导和推动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人的生活领域是全面的,人的需要也是全面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方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人们的需要中,“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③。随着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崇物质财富和过度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并不符合时代要求,文化生活和消费越来越成为时代风尚。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讲的文化,不是商品化的文化或文化的商品化,而是与铜臭气绝缘、与功利心相脱离,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为导向,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文化。这种文化以“人”为本,以“化人”为目的,是一种高尚的文化。毫无疑问,精神文化生活构成了绿色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或根本底蕴。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是一种绿色生活方式,精神文化消费是一种绿色消费方式。与物质生活相比较,精神文化生活具有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精神文化生产虽然也离不开自然界,但它对自然的依赖性以及破坏性较小。另一方面,在唯物史观中,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彼此分离、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支撑、相互渗透,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其中包含着文化与道德的因素。精神文化生活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道德素质,并进而对物质生活起一种引导或调节作用。很难想象,在没有人们精神境界和道德素质提高的基础上整个社会能够建立起一种科学的消费方式。因此,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构建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保障,甚至是根本保障。事实上,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的生活需要不断转型升级,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不仅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注重个性化和品质化。这不仅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或切入点,也给绿色生活方式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历史性契机。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侯彦杰、吴比《现代消费方式的生态伦理选择》,《学术交流》2016年第4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页。

③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